【区域经济理论】

人文经济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建构与路径选择

张林山 公丕明

摘 要：立足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人文经济的视角审视区域发展，为推动发展范式转向、破解传统增长困境提供了关键思路。人文经济与区域发展在价值、空间、治理三个维度实现理论耦合，并通过推动价值重塑与发展动能升维、空间赋能与意义场所激活、治理优化与多元共治构建，重塑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体系。实践表明，人文经济在推动发展目标复合化、空间格局网络化、产业融合深度化与治理模式协同化方面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人文要素开发不足、价值融合不畅、地方特色弱化与制度适配滞后等挑战。新时期应围绕深化人文要素开发与优化配置、推动人文价值与发展目标深度适配、强化区域人文特色培育、精准优化人文制度供给等方面，将人文经济理念系统融入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行动框架。

关键词：人文经济；区域发展；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1-0024-11 **收稿日期**：2025-12-15

作者简介：张林山，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35）。

公丕明，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35）。

在全球经济深度转型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区域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传统区域发展模式往往侧重经济增长速度与规模扩张，相对忽视人文价值引领、社会包容性与文化生态可持续性，这导致部分地区面临增长动力疲软、发展韧性不足、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失调等多重挑战。面对新发展阶段的多重挑战，单纯依赖传统经济运行逻辑已难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因此亟须推动发展范式的人文转向。人文经济视角正是对传统区域发展局限的必要补充，强调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生态伦理、文化传承及社会福祉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进步为根本导向（罗卫东，2025），重新审视和塑造区域发展的逻辑与路径。由此审视区域发展，有助于更系统地把握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物质丰富与精神充实、短期效益与长期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破解发展动力衰减、认同危机与不可持续等问题提供新路径。基于此，本文立足人文经济学理论内核，系统梳理人文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精准识别发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构建契合我国区域发展实际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既是丰富人文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回应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需求的必然选择。

一、人文经济视角下区域发展的理论建构

人文经济视角下的区域发展，实现了从单一经济增长逻辑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文化赋能为导向的综合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它强调经济发展深植于社会文化脉络，通过激活区域独特的人文基因，重塑发展目标、激发内生动力、创新空间生

产与治理模式，旨在实现物质繁荣与精神富足、特色彰显与包容共享、当代福祉与长远可持续的有机统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人文经济的核心要义与区域适配

人文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重新嵌入社会文化脉络的发展范式转变。它不仅在理论上重构了区域发展的价值坐标与认知框架，更在实践中深刻影响着要素的空间分布与区域发展路径。

1.人文经济的核心要义

人文经济的核心要义体现为对传统发展范式的系统性反思与价值性重构，主张经济发展并非自洽的孤立过程，而是深植于社会文化脉络之中、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人文经济的理论内涵涉及三重维度：在本体论层面，强调经济的人文嵌入性，即一切生产、交换与消费行为皆在特定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关系中展开，脱离文化语境的经济分析将丧失真实性与解释力（王立胜等，2025）。在价值论层面，倡导发展的多元价值统合，批判以GDP为中心的物质主义评价体系，主张将社会公平、文化繁荣、生态健康和精神充实纳入发展的核心维度，以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张二震等，2025）。在方法论层面，注重关系性与整体性分析，突破将个体抽象为“经济人”的传统范式，转向关注由人与人、人与社区、人与环境互动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认为发展内生的动力正源于此类网络所孕育的社会信任、协作机制、文化认同与集体创新能力（任平，2025）。由此可见，人文经济不仅重塑了发展的目标与评价体系，也重构了经济行为与社会文化互动的认知框架，为超越单一增长逻辑、构建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深层的理论依据。

2.人文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区域适配性

在人文经济学视角下，人文要素特指深植于特定区域社会肌理与文化脉络中，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驱动发展的物质、非物质、非量化要素的复合系统。其内涵可解构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文化资源，作为系统的基础“原材料”，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知识及当代创意；二是社会资本，作为系统的“催化剂”，是指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规范与合作能力，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三是价值认同，作为系统的“精神内核”，涵盖地方归属感、集体伦理与对长远价值的共识，为区域发展提供深层激励与方向引领。这一要素体系通过意义赋予、关系赋能和认同激励，为区域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内生动力、降低了系统性运行成本，并引导其走向更具包容性、特色化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人文要素在空间上遵循非均质、层级化与网络化的分布规律，其形态深度根植于区域的历史文化基底、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之中，总体呈现历史文化富集区引领、城乡梯度扩散与创新节点聚合的特征（王长松，2025）。宏观上，人文要素集中分布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重要历史脉络带，如大运河、丝绸之路沿线，以及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当代高水平文化与科技融合区域，形成“廊道—集群”交织的格局，这实质上是地方文脉、集体记忆与创新网络长期互构的结果。在城乡维度上，分布呈现功能互补：中心城市主要承担高附加值的创意设计、数字内容等要素的孵化与辐射功能；乡村则依托生态、非遗等乡土资本，发展文旅、手工艺等根植性强的特色模式（桂华，2024）。推动人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超越简单的产业移植或标准化复制，转向精准识别并系统激活每个区域独特的内生性文化资本。这要求构建能够有效连接地方身份认同、社会信任体系与现代市场机制的特色化制度与治理模式，从而真正实现从人文资源到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创造性转化。

（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导向

在区域维度上，人文导向为高质量发展赋予了灵魂、尺度与温度，使其从一个偏重技术效率的经济范畴，升维为一个融合物质基础与精神追求的综合性文明进程。

1.在目标向度上追求整体性繁荣

人文导向下的区域发展超越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单一经济逻辑，转向一个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性目标体系。这不仅要求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现代化，更强调同步推动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与繁荣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包容和谐、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与优美宜居，最终落脚于居民在物质生活、精神追求、社会参与及自我实现等多维度福祉的实质提升（杨玉珍，2025）。其终极目标是塑造一个有吸引力、有归属感、有创造力的高品质生活空间与共同精神家园，以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有效转化为更广泛

的社会共享机会、更丰富的文化供给、更优质的生态环境以及更充盈的个人生命体验，从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

2.在动力向度上强调内生性激发

主要依赖外部资本投入与要素规模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易导致发展路径脆弱、区域竞争同质化等问题。人文导向则致力于将发展的根本动力转向内嵌于区域历史脉络、社会结构与文化肌理中的“软性”资本。这系统性地包括：对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朴素的生态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形成具有市场价值和认同感的独特文化IP、品牌资产与可持续商业模式，构筑差异化竞争优势（徐剑，2024）；积极培育基于高度信任、互惠规范与共同愿景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隐性知识溢出、资源优化配置与跨领域协同创新；长期持续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如提升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质量、完善公共健康服务体系、提高全民艺术素养与科技创新能力等，从而系统性构筑面向未来、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与社会进步的核心人力资本与创造力资本。

3.在路径向度上倡导特色化与包容性并行

人文导向坚决摒弃“千城一面”的简单模仿与低水平重复建设，积极鼓励各区域基于深入的文化自觉，审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以及民众的集体意愿与发展期待，探索并坚持一条彰显本土魅力、符合自身条件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沈开艳等，2025）。同时，这条特色化发展道路必须内嵌深刻的包容性伦理要求与制度设计，即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干预与资源分配机制，确保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发展机会、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丰富的文化成果能够被区域内、不同区域间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公平地共享与获取。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加剧社会贫富分化或导致特定群体与文化形态的边缘化，最终实现特色发展与普惠公平的有机统一。

4.在尺度向度上秉持多尺度协调的可持续性

人文导向下的区域发展，要求建立一种跨越不同维度、兼顾多重利益的系统性可持续观。在时间尺度上，必须统筹当代人的发展需求与子孙后代的福祉权利，珍视、保护并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对未来负责。在空间尺度上，需要协调局部的优化提升与区域整体的功能布局和利益格局，共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基础设施网络与文化多样性系统。在社会尺度上，要审慎平衡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于构建一个既充满市场活力与社会创新动能，又能保障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和成果共享的正义社会结构。这是一种融通历史、现在与未来，协调本地、区域乃至全球关联，兼顾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多元目标的立体化、整体性、持续性发展哲学。

（三）人文经济与区域发展的理论耦合

人文经济理念与区域发展实践并非简单的理论与应用关系，而是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理论耦合。这种耦合可以通过构建一个“价值—空间—治理”的三维整合分析框架来系统阐释，它揭示了人文因素如何从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核心变量，进而重塑区域发展的逻辑。

1.从增长主义到人文主义的价值重塑

传统区域竞争理论奠基于比较优势与经济增长的“竞赛”逻辑。人文经济与区域发展的耦合，首先在于将以人为本的普遍价值与地方认同的特殊价值，深度植入区域发展的目标函数与评价体系。它促使区域战略的制定，既要回应国家宏观层面关于共同富裕、文化强国、生态文明等价值导向，又必须根植于地方的历史叙事、集体记忆与民众的共同情感（安晓明等，2025）。这种耦合实现了发展价值从单一的经济理性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复合理性的跃迁，驱动区域竞争从比拼GDP规模和增长速度，转向比拼综合生活品质、文化吸引力、创新生态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即从“硬实力”竞赛升维为“综合魅力”的竞赛。

2.从“容器”空间到意义场所的载体转向

区域发展总是在具体的空间载体上发生。传统理论常将空间视为均质的、被动的“容器”或生产要素的“投影面”。人文经济视角则与人文地理学、空间生产理论相耦合，将空间视为充满意义、情感与权力的“社会—文化”建构。这种耦合强调，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规划、更新与营造，不应仅是功能分区与效率最大化过程，更应是文化传承、社会关系再生产与地方认同塑造的过程（王淑娇，2023）。它要求，在旧城更新中保护历史文脉与社区网络、在新区建设中注入文化符号与公共艺术、在乡村振兴中活化乡土景观与传统村落，使物理空

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激发文化创造、促进社会交往的意义场所。经济发展与空间生产在此过程中深度融合，文化价值被刻写于空间肌理，进而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经济价值。

3.从管理控制到多元共生的治理创新

实现前述价值与空间的深度耦合，最终依赖于区域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这要求构建一种文化敏感性与多元主体性兼具的新型治理体系。人文经济与区域治理的耦合体现在：治理目标上，从专注于经济增长的“管理”，转向统筹多元价值实现的“善治”；治理主体上，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由政府、经营主体、文化机构、社区组织、居民个体乃至专家学者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尤其强调赋予在地社区与文化传承者话语权与决策参与权（徐国冲等，2023）；治理工具上，从依赖行政命令与财政刺激，转向综合运用文化规划、社区赋能、社会企业培育、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协议等柔性、激励性工具；治理过程上，强调公开透明、协商共识，将发展过程本身作为培育社会资本、增进文化理解、提升公共精神的社会学习过程。通过这种治理耦合，人文经济理念得以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政策实践中找到制度化、可持续的区域治理实现路径。

二、人文经济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传统理论多聚焦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外显要素的投入，而人文经济视角则揭示深植于社会肌理与文化脉络中的人文要素，通过“价值—空间—治理”三维耦合的转化与赋能过程，构成的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持久且更具包容性的内生动力系统（见图1）。

（一）人文内核引领价值重塑与发展动能升维

人文经济与区域发展耦合首要体现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从增长主义到人文主义的深层重塑。这种重塑并非否定经济理性，而是将以人为本的普遍价值与地方认同的特殊价值深度植入增长目标函数，驱动增长动力的根本转换。这一转换通过以下三条核心路径实现。

1.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路径

该路径旨在通过创意设计、数字技术与体验经济，将历史遗产、民俗技艺等文化禀赋系统性地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文化资本、知识产权与品牌资产，从而实现市场价值（王先庆等，2025）。其微观传导始于创意确权与法律保护：文化元素完成创造性转化后，需通过版权登记或区块链存证等手段，赋予其清晰的“数字身份”，以保障创新收益、遏制仿冒。例如，山东肥城桃木雕刻产业通过构建版权保护体系，推动年产值突破185亿元；贵州则为苗绣纹样建立区块链存证体系。此后，传导进入价值延伸与市场扩张：获得产权保障的文化IP，通过授权、联名等方式嵌入广泛消费链条。如“苏绣”通过建立数字纹样库与标准，开发出从高端定制到日常文创的完整产品系列，实现了从工艺到品牌资产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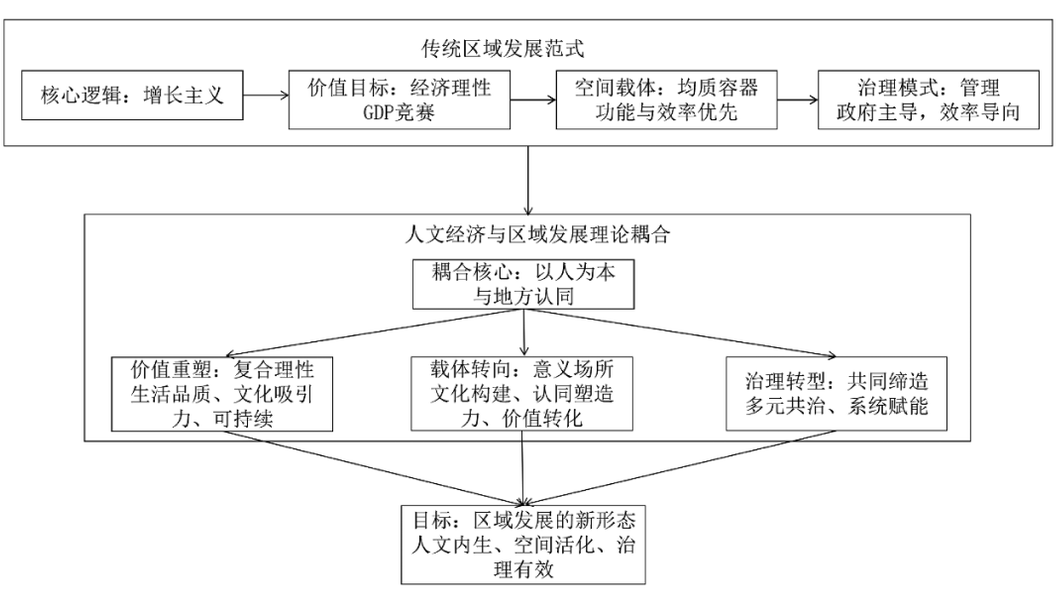


图1　人文经济与区域发展的理论耦合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跃迁。通过微观的确权与授权操作，以及宏观上汇聚为新业态的规模发展，完成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的持续转化。

2.社会资本的效率赋能路径

该路径核心在于通过高信任、强合作的社会网络降低市场交易的信息、监督与执行成本，促进知识溢出与非正式协作，形成超越正式契约的协同效应。其微观传导始于社区或产业集群内关系资本的积累——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平台或高频互动，建立深厚的互信与合作规范。这种信任能显著降低沟通与协作的摩擦成本，使企业更愿在信任网络内分享信息、协同攻关。这一过程最终转化为可观测的效率提升（李扬等，2023）。例如，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通过构建集成技术、人才与服务的产业生态，依托园区内紧密的协作网络，显著降低影视项目综合制作成本。因此，该路径本质是将微观层面基于信任的非正式协作，系统性地汇聚为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与运行效率。

3.地方认同的内源性激励路径

该路径核心在于强烈的文化归属感能同时激发本土企业家精神与在地消费偏好，从而引导供给与需求共同根植于本地，形成内生增长模式。其微观传导始于个体对地域文化的情感认同，具体分化为两类经济行为：一方面，本土企业家出于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责任感，更倾向于将资本长期投入与本地文化禀赋相结合的产业。例如，徐州本土企业基于对家乡饮食文化的深度认同，投资打造历史街区中的饮食文化博物馆，将文史资源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文化地标。另一方面，本地居民与消费者的文化认同会显著提升其对本土品牌的感知价值与信任度，直接转化为更强的购买意愿。例如，昆山通过培育“咖啡+昆曲”“咖啡+文创”等业态，将文化符号植入现代消费场景，激发情感消费。微观层面无数基于认同的投资与消费选择持续汇集，共同构筑了本土特色产业与品牌的市场根基，形成自内而外、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二）人文载体驱动空间赋能与意义场所激活

人文经济与区域发展耦合在空间维度上，将区域空间从均质化的“容器”转化为充满意义、情感与权利的“社会—文化”建构，经济发展与空间生产在此过程中深度融合。

1.文化资源的空间再生产机制

该机制旨在通过规划、更新与营造，将人文价值刻写入物理机理，使空间本身转化为文化资本，从而将文化遗产转变为可体验、可消费的空间产品，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其微观传导始于保护性活化干预，即通过精细的微更新，在保留历史肌理与社区网络的同时植入新文化功能与叙事。例如，上海思南公馆街区，在保护历史建筑基础上引入文化业态与活动，使空间从静态载体转变为动态文化体验场域。由此进入价值实现与空间溢价阶段：活化后的空间成为高吸引力消费目的地，这不仅能通过商业与活动直接创造收益，更能显著提升周边品质感知，吸引创意阶层集聚，形成文化地标驱动的价值增长极。该机制的本质是通过专业运营，将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情感价值转化为空间的体验与区位价值，实现文化资本向空间经济资本的融合发展。

2.产业融合的空间聚合机制

该机制指人文价值作为“黏合剂”推动“文化+”等跨界融合在具体空间落地，形成数字文创园区等新形态，使空间成为价值共生与创新孵化的场域。其微观传导始于构建能激发跨界连接与低成本试错的环境，基础是对空间与制度进行针对性设计，如改造闲置厂房为灵活办公空间并配套孵化器与扶持政策（曾楠，2025）。以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为例，通过空间改造与跨界活动，创造了不同领域从业者高频非正式交流的微观环境，显著降低了寻找合作伙伴的信息与信任成本。由此传导进入知识重组与业态生成阶段：在共享空间内，文化、科技、商业知识得以碰撞重组，例如，游戏团队可与相邻的动漫或VR公司便捷合作，催生出数字艺术等融合型新业态。该机制的本质是通过构建“物理空间+服务生态+制度激励”复合体，系统降低融合创新门槛与风险，使空间从被动容器升维为主动的创新孵化器。

3.意义场所的价值共创机制

该机制旨在通过有意识的设计与运营，将物理空间建构为承载记忆、促进交往与激发创造的场所，从而形成“人文价值提升—空间品质优化—经济价值增长”的良性循环，使空间从经济背景升维为价值创造主体。其微观传导始于将空间塑造为社会情感容器，关键是通过设计营造能引发共鸣、

鼓励互动的场所特质。例如，成都远洋太古里成功在于保留传统街巷尺度与历史建筑，并设计大量公共广场与开放空间，结合艺术文化活动，使商业空间同时成为市民客厅与文化窗口，建构出强烈的地方感（刘彬等，2018）。由此启动吸引力转化与价值增强循环：独特的场所精神转化为品牌美誉度并自发传播，持续吸引游客、人才与关联企业。人流与关注的汇聚直接提升商业销售额与资产价值，而由此产生的经济收益又反哺于空间的维护与文化活动，形成“场所魅力提升—人流消费集聚—收益反哺营造”的可持续闭环。该机制的本质是将人文价值内化为空间的核心竞争力，使其从静态成本中心转变为能主动吸引资源并持续增值的价值主体。

（三）人文制度引领治理优化与多元共治构建

实现价值与空间的深层耦合，最终依赖于区域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创新与人文制度的深度适配。这要求构建文化敏感、多元主体共生的治理体系，推动从单一经济增长导向的“管理”转向统筹多元价值的“善治”，其核心在于促进正式“硬制度”与地方性习俗、伦理等“软制度”的创造性融合。

1.凝聚地方共识，增强治理认同

区域治理的关键，在于将宏观政策目标与微观社区的文化心理及公平认知相衔接，形成一个深刻地在地化过程。这意味着政策设计必须超越简单移植，通过前置的社会文化评估，主动识别并融入当地关于资源分配与利益共享的传统智慧与伦理共识。例如，云南丽江在文旅融合中，依托多民族文化心理，通过“公司+集体+农户”模式保障居民公平共享发展红利。江西婺源在“篁岭晒秋”开发中，通过产权置换、迁居安置等方式，将村民的文化主体性转化为发展动力。这种基于文化尊重与公平考量的政策调适，实质是将外在行政要求转化为社区内在认可的共同行动纲领。它极大地降低了执行与协商成本，构建了源于共识的认同型合法性，确保了发展项目能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土壤，是实现可持续治理的重要基石。

2.激活柔性规范，构建韧性网络

面对复杂的地方性事务，刚性的正式制度常显不足，而根植于社区的非正式规范、道德舆论等“软制度”则成为弥补空白、增强治理韧性的关键资源。这些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柔性规范，具有内生的情境化约束力，能以更灵活、人性化的方式处理法律难以覆盖的微观事务，如纠纷调解与风貌协商。福建漳州在活化“非世遗”土楼时，便通过激活宗族网络与社区精神，引导社会力量将土楼活化为多元文化空间。浙江温州在城中村改造中，则借助“侨乡”网络与乡贤理事会进行协商调解。这些实践表明，培育柔性规范，是在构建一个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多层互补的韧性网络。当法理与情理协同共振时，治理体系便获得了更强的适应性、包容性与自我修复能力，能实现稳定与活力的动态平衡。

3.构建多元网络，激发协同创造

激发区域发展内生动力的核心，在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与社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功能互补的行动者网络。在此网络中，政府是规则设计者与过程护航者，企业提供效率与资本，专业机构贡献知识与技术，而在地社区作为知识与文化的主体，其诉求与创意是网络的中心（方雷，2014）。浙江安吉的竹林碳汇改革是典范，政府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科研机构提供方法论、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最终使农户获得生态回报。广东佛山在岭南广府文化复兴中，则形成了“政府引导—工匠传承—市场运营”的网络，共同将传统技艺转化为现代文创与体验产品。这种网络化治理，不仅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经济效益，更重塑了社区的主体地位，使发展从外部“输血”变为内部“造血”，实现了真正的共建、共治与共享。

4.涵养长期主义，引导价值共创

为克服发展中的短视化倾向，必须在制度设计的源头上系统性嵌入责任、诚信与可持续等核心人文价值，以塑造各方的长期行为预期。这需要一套连贯的制度创新：建立超越经济指标的综合考核体系，探索新型金融工具，并设立刚性的长期战略影响评估机制。浙江安吉余村开发矿坑项目时，创新“生态价值核算+长期租赁+利润共享”模式，将生态修复与社区共生责任内化为商业条款。山西在古村落保护中推行的文物建筑认领认养制度，要求认养者在修缮利用的同时，履行向公众开放、承担文化展示等长期社会责任。这类价值嵌入型制度，向市场传递出必须将长期社会文化效益纳入商业模式的清晰信号。它能筛选出有远见的行动者，逐步培育出追求长期价值共创、注重代际公平的合作伦理与文化，为区域的永续繁荣奠定最坚实的制度根基。

三、人文经济视角下区域发展的现实考察

理论揭示的作用机制，其有效性最终需通过实践检验。当前，人文经济的“价值—空间—治理”三维机制已在区域发展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推动发展范式跃升、空间格局优化、产业价值升级与治理生态现代化。然而，机制在现实运行中也衍生出人文要素开发不足与配置失衡、人文价值与经济目标适配性不足、区域特色流失与同质化竞争、制度供给与需求错配等现实困境，亟待深入考察与系统破解。

（一）人文经济视角下区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人文经济理念的深入实践，正在系统性地重塑中国区域发展的路径，其显著成效已从宏观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可推广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效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上，更在于发展范式、空间格局、产业动能与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而独特的文化内驱力。

1.推动区域发展目标范式跃升

人文经济区域实践的核心成效，在于引领区域发展目标实现了根本性的范式升级，推动发展逻辑从追求GDP增长的单一维度转向涵盖经济活力、文化繁荣、生态健康与生活福祉的复合型目标体系。在这一新范式下，经济增长被重新定位为实现文化认同、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等更高层次价值的基石与手段，而非终极目的。这具体体现为，各地在战略规划中普遍将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治理提升至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谋求协同共进。例如，苏州的古城区保护与更新、杭州的“拥江发展”等实践，均将产业升级、历史街区的活态传承、公共空间的美学营造、社区关系修复等目标纳入整体框架，其追求的正是一种超越物质积累、包含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的整体性繁荣。这种价值理性的回归，有效规避了“千城一面”与粗放式扩张，引导区域走向更具独特性、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最终体现为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普遍提升，以及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根本增强。

2.重塑国土空间与城乡发展新格局

人文经济实践在空间层面显著优化了国土空间格局并重塑了城乡关系，核心在于推动人文经济活动从孤立的文化据点向跨越行政边界、连通城乡的“文化—生态—经济”复合功能网络演进。这一趋势突出体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如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本质是以线性文化遗产为纽带，系统串联沿线自然生态、历史遗存、城镇与产业资源。这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更是以文化为引领对区域空间进行战略性重构，促进文旅、生态、农业等产业联动，形成融合文化传承、经济活力与生态功能的发展廊道，从而在宏观尺度优化国土开发保护格局。同时，人文经济强化了县城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载体。通过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与特色生态资源，许多县城与乡村依托根植性强的特色产业，成功从要素流出地转变为价值增值地，有效带动人才与资本回流，促进了公共服务与消费市场下沉，不仅缓解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更塑造了城乡功能互补、特色鲜明、共荣共生的新型空间格局。

3.驱动产业价值跃升

“文化+”与“+文化”已成为驱动产业升级与价值创造的核心路径，文化要素不再仅是独立的产业门类，而是作为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深度渗透并系统赋能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全产业链。在农业领域，源于浙江“千万工程”的美丽乡村持续催生“美丽经济”，如农耕文化、田园景观与休闲旅游、健康养生、文创开发等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农业生态的整体价值。在制造业领域，如福建德化陶瓷等传统产业，通过将千年技艺与现代设计、国际审美相结合，不仅实现了产品附加值的跃升，更塑造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品牌，完成了从文化价值到市场价值与品牌价值的系统性转化。在服务业领域，江苏打造的“苏超”足球联赛成为现象级IP，单场上座超6万人，线上传播超百亿次，带动全域消费380亿元。这种深度融合，本质上是产业运行逻辑从成本竞争向价值竞争的关键跃迁，不仅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降低了对传统资源与外部投资的过度依赖，更培育了基于独特文化IP和在地知识、难以复制的区域品牌与产业集群，从而构筑起持久的核心竞争力。

4.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发展生态现代化

人文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与价值多元性，深刻推动了区域治理模式向现代化的转型，其核心成效在于构建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成果共

享”的协同治理生态。实践中，政府角色从直接“划桨”更多转向战略“掌舵”与平台搭建，通过规划引领、制度创新与公共服务，为经营与社会主体赋能。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文化传承者等多元力量被广泛激活，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发展、社区营造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例如，在生态保护、旧城更新等综合性项目中，协同机制平衡了经济增长、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与社区福祉；又如云南鹤庆银器、贵州雷山苗绣等项目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运营、手艺人创作、行业赋能”的有机生态。这种基于规则、信任与协商的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政策认同与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统筹了多重发展目标，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稳固而有韧性的制度与社会基础。

（二）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区域发展的现实困境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在人文经济维度上的探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深层次的矛盾与结构性困境仍然突出。从人文经济学视角审视，这些困境集中表现为要素开发、价值适配、特色塑造与制度供给等关键环节的系统性梗阻。这四大困境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彼此强化的负向循环系统，共同制约着区域发展向更高层次跃迁。

1.人文要素开发不足与配置失衡并存

人文要素开发深度与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人文要素的开发与配置面临三重困境，制约着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的发挥。一是认知性开发不足，其价值被严重低估与遮蔽，这根本上源于缺乏将人文价值进行系统评估与核算的正式制度安排。在传统发展观影响下，许多地区仅将人文要素视为辅助性工具，未能将其作为战略性资产予以系统评估，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知识等处于隐性状态，直接导致区域在谋划发展时缺乏独特的资源基础，为后续的特色流失埋下伏笔。二是结构性配置失衡，扩大了区域与群体间的发展鸿沟，这反映了制度供给在区域间的非均等化以及权益保障制度的缺失。人文要素的分布与转化呈现显著的差距：东部及中心城市凭借优势平台能高效实现资本转化，而中西部与乡村地区虽资源丰厚，却因人才、资本等短板陷入“富饶的贫困”；同时，文化持有者往往处于价值链底端，难以公平分享收益，导致传承主体流失，这从根本上侵蚀了人文价值所追求的公平性，直接构成了后续价值适配困境的现实。三是市场化转化机制不畅，限制其经济潜能的释放。将信任、认同等抽象资本转化为具体产品与商业模式，需要成熟的金融工具与市场体系，如文化资产评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等，而目前这些中间机制尚不健全，导致人文要素难以吸引社会资本，长期依赖政府投入，无法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自我造血循环。

2.人文价值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性不足

人文价值追求公平、包容、传承与精神满足，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则崇尚效率、竞争、创新与物质积累。两者在区域发展实践中的融合常面临深层张力，不仅源于理念差异，更根源于系统性的制度安排缺陷，亦是前述要素困境在目标与理念层面的集中反映与深化。适配性不足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目标排序存在冲突，这根源在于以GDP增长与短期显性政绩为核心的考核与决策制度。在短期经济增长与显性政绩的压力下，公平、传承等深层次人文价值目标常被视为“软约束”，被迫让位于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等经济效益目标，导致发展可能伴生文化认同消解等隐性代价。二是市场逻辑对文化逻辑侵蚀，问题在于推动文化领域市场化改革的配套制度不完善。当文化发展完全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快速回报的市场力量主导时，地方特色易被简化为迎合大众消费的浅表符号与同质化产品，而需要长期投入的深度传承与教育项目则难以获得支持，使得文化存在偏离其精神内核、沦为纯粹消费符号的风险。三是代际与跨期协调困境，则直接暴露了缺乏鼓励长期主义的治理制度设计。人文价值的培育效益显现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这与官员任期内的考核周期、市场资本的短期回报要求存在矛盾，导致许多利于长远人文积淀的基础性工作缺乏持续投入，区域发展容易陷入“重短期项目、轻长期滋养”的短视陷阱。这三重矛盾共同揭示了单纯依赖传统经济逻辑难以实现人文与经济的真正融合。

3.区域人文特色流失与同质化竞争严重

特色流失与同质化竞争，是要素开发不足和价值适配困境所必然导致的外在结果与综合表现。当前，塑造独特的人文经济标识成为区域竞争的关键，然而现实却陷入特色流失与低水平同质化的普

遍困境，直接表现是规划与产业的“千城一面”。从南北仿古街、雷同主题公园到乡村复制的民宿集群，皆源于对成功案例的简单模仿而忽视本地人文基因，导致区域辨识度模糊并陷入低价竞争，深层原因则涉及系统性缺陷。一是内生创新动力不足，缺乏对自身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梳理与现代表达的能力，而这正是由于对本地人文要素认知浅、挖掘能力弱，以及创意人才因价值不被重视和回报机制缺失而流失所直接造成的。二是标准化评价体系的负面引导，以规模、增速为核心的考核鼓励了快速复制的大项目，而非需精心培育的特色精品，这与追求短期显绩的价值适配困境同源同构。三是创意要素单向流动，人才向大城市集聚使基层地区面临创意“贫血”，无力支撑特色化发展。同质化竞争的本质是区域在人文经济维度上“主体性”的丧失，它放弃了基于自身历史与生活方式的创造性路径，接受去地域化的通用方案，这不仅导致经济上的低效内卷，更造成地方文化多样性的衰竭，与人文经济追求特色、多元的初衷相悖。

4.人文制度供给与区域发展需求存在错配

适宜的制度环境是破解上述三大困境、保障人文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支撑。然而，当前制度供给在多个层面与复杂多元的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显著错配，进而成为使整个系统陷入僵局的关键性瓶颈与掣肘。一是制度缺失。面对历史建筑产权流转、社区文化资产共营、文化遗产数字版权归属等新业态与新关系，缺乏清晰、稳定、可操作的上位法规，制度空白增加了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抑制了社会参与。二是制度僵化。部分脱胎于传统管理思维的制度难以适应人文经济跨界融合的特性，例如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可能阻碍旧厂房创新利用，按传统行业划分的政策难以有效覆盖“文化+”等融合项目，这直接阻碍了特色培育，使得人文价值在具体项目中难以实现。三是制度执行偏差。基层执行中易出现机械或异化现象，如将文化遗产保护执行为禁止一切变动的僵化管控，或将文旅融合简化为盲目招商上项目，忽视文化遗产保护。此外，文化、旅游、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政策协同困难，难以形成支持人文经济系统性发展的制度合力。因此，制度供给在回应新需求、适应新形态及确保精准落地方面的滞后与脱节，构成了制约人文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瓶颈。

四、人文经济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破解人文经济视角下区域发展的系统性困境，需以制度创新为引领、以要素激活为抓手、以价值融合为目标、以特色培育为导向，构建全链条对策体系。通过精准施策打通关键堵点，打破负向循环，推动区域发展实现人文价值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协同跃升。

（一）深化人文要素开发与优化配置，激活内生动力

聚焦认知、配置、转化三大关键环节，全方位提升人文要素效能。一是构建科学认知与价值量化体系。加快建立人文资源价值评估与核算体系，制定涵盖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维度的综合评估标准，系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知识等资产的普查、确权与登记。通过将评估后的人文资产纳入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或专门账户，使其价值显性化、可量化，从而在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中获得应有权重，从根本上解决其被低估的问题。二是创新公平高效的要素配置机制。实施人文要素均衡配置专项工程，运用财政转移支付与生态文化补偿等工具，强化对中西部及乡村地区的定向支持。同时搭建跨区域要素流通平台，并建立文化持有者收益共享机制，通过明确知识产权、推广利益分成合同、提供税收优惠与专项补贴，确保传承主体公平分享收益，激发内生动力，缓解区域与群体间的配置失衡。三是健全市场化转化支撑生态。重点建设包括权威评估机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专业金融服务在内的中间支撑体系，创新开发文化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同时大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运营主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人文要素开发，推动人文要素开发从政府主导的“输血”模式，转向市场化、产业化的可持续“自我造血”循环，全面释放其经济与社会潜能。

（二）推动人文价值与发展目标深度适配，化解融合张力

以制度优化协调多元目标，实现人文价值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一是将人文发展指标深度融入政绩考核体系。优化政绩考核体系，超越

GDP单一导向，显著提升文化遗产传承状况、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社区凝聚力及文化创意产业附加值等关键指标在考核中的权重，并建立配套激励约束机制，以此引导政府决策统筹短期绩效与长期人文积淀，从源头上纠正目标排序冲突。二是建立健全市场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平衡协调机制。完善市场化配套制度，明确核心文化遗产与公益性项目的保护边界，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长期税收减免与补贴，扶持深度传承与研究教育项目。同时，通过版权规范与行业标准引导文化产品开发，在尊重文化本体价值基础上进行创新，防止其沦为浅表化消费符号。三是构建鼓励长期主义的跨期治理框架。建立具有刚性约束力的人文发展中长期规划，并与相关规划有效衔接。推行重要人文项目的责任追溯与离任审计制度，保障政策连续性。同时，通过设计长期金融工具、设立影响力投资引导基金等方式，激励社会资本进行长远投资，并对基础性人文研究、人才培养等给予持续稳定的财政支持，从而系统性地克服由任期周期与资本短期性导致的“短视陷阱”，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根基。

（三）强化区域人文特色培育，破解同质化困境

以本土基因挖掘与创新表达为核心，构建特色化发展路径。一是系统性激发内生创新活力。开展全域精细化文化资源普查与谱系梳理，建立动态更新的本土人文基因数据库，系统解码其历史脉络、精神内核与现代表达潜能。同时，着力培育扎根地方的创意人才，通过设立产学研协同的创意孵化基地、实施专项人才计划、共建高校实训平台等方式，全面提升从文化资源识别、IP提炼到产品转化与品牌塑造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二是改革以规模和增速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推动建立以特色鲜明度、文化内涵深度、工艺品质优良度、可持续性为核心的新型评价标准，并将其切实应用于项目审批、资金扶持与成效评估。积极鼓励“一县一品”“一镇一特”的差异化探索，从制度上杜绝简单模仿，引导资源投向具有长期生命力的特色精品。三是构建吸引并留住创意人才的长效生态。实施创意人才下沉计划，通过职称倾斜、住房保障、创业扶持及收益分享等政策，引导创意人才向基层和资源富集地区流动，并搭建数字化城乡协作网络以促进智力资源共享。特色塑造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支持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社区博物馆与活态传承工坊等方式，将日常生活空间转化为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活态场域，使本地居民真正成为文化认同维系与特色创新的主体，从而在根本上重塑区域发展的文化主体性。

（四）精准优化人文制度供给，筑牢发展保障

聚焦制度缺失、僵化、执行偏差等问题，构建适配性强、协同高效的制度体系。一是加快关键领域的立法与标准制定。聚焦历史建筑产权、文化遗产数字版权等新业态，补齐制度供给短板，通过出台清晰的上位法规及配套实施细则，明确产权归属、交易流程与各方权责边界，有效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与合规风险，充分激发社会资本参与人文资源开发利用的活力。二是推动现有制度的柔性化与适应性改革。打破传统管理思维束缚，放宽旧厂房、老街区等存量空间创新利用限制，摒弃“一刀切”管控模式，制定适配“文化+旅游”“文化+科技”等融合项目的跨行业支持政策，建立土地用途动态调整机制，精准适配人文经济跨界融合、多元发展的特性。三是健全制度协同实施与动态调整机制。规范执行流程，加强基层执法人员人文资源保护、跨领域政策解读等专业培训，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监管机制，杜绝僵化管控与异化执行问题。打破部门条块分割壁垒，建立文化、旅游、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常态化协同会商机制，健全政策统筹与联动实施体系，凝聚制度合力。同步搭建政策效能评估与动态调整平台，定期收集经营主体、社区居民及行业协会反馈意见，对执行效果不佳、偏离政策初衷的内容及时修正优化，确保制度供给精准对接人文经济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罗卫东.人文经济学的建构方向和实践路径[N].光明日报，2025-08-05.

[2]王立胜，段博森.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进展和展望[J].经济纵横，2025(4).

[3]张二震，戴翔.人文经济的创新性、超越性及其内在机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5，62(5).

[4]任平.人文经济学本质内涵的哲学阐释[N].光明日报，2025-08-04.

[5]王长松.人文经济驱动下的人民城市实践与探索[J].人民论坛，2025(10).

[6]桂华.走向功能性融合：超越二元结构的城乡发展路

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21).
[7]杨玉珍.以人文经济学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J].红旗文稿,2025(17).
[8]徐剑.城市人文经济:以文化为支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4).
[9]沈开艳,路嘉煜.探索城市特色发展新动力[N].人民日报,2025-08-21.
[10]安晓明,张可云,刘夏.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构建[J].改革,2025(10).
[11]王淑娇.从"空间"到"场所":当代城市空间重塑与文化再生的认知视角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2).
[12]徐国冲,卢之卿,潘金鲜.走向治理效能评估:基于场域、价值与角色的三维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9(1).
[13]王先庆,陈喜强,郭兴荣.文化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模式与经验研究:兼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J].城市观察,2025(4).
[14]李扬,战炤磊.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机制:人文经济的基因探赜与路径选择[J].探索与争鸣,2023(9).
[15]曾楠.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城市空间再造与优化[J/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10-30.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10/t20251030_5922283.shtml.
[16]刘彬,陈忠暖.权力、资本与空间:历史街区改造背景下的城市消费空间生产:以成都远洋太古里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8,33(1).
[17]方雷.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供给[J].理论探讨,2014(1).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ath Selection for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y

Zhang Linshan Gong Pim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y has become a key perspective for promoting the shift in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addressing traditional growth dilemmas. Humanistic econom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chieve theoretical coupling in three dimensions: value, space, and governance. Through promoting value reshaping and upgrading of development momentum, spatial empowerment and activation of meaningful places, and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and diversified co-governanc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syste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reshaped.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humanistic econom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omoting the compounding of development goals, networking of spatial patterns, deepening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governance models. However,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elements, poor integration of values, weakening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gging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focus on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humanistic elements, promoting deep adaptation of humanistic values to development goals,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regional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ecisely optimizing the supply of humanistic systems. We shoul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n action framework for transforming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economy into a sustainable path for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Regional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正 漪)